

逻辑何为

——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

晋荣东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序.....	彭漪涟	1
导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逻辑现代化的积极进展		4
三、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困境与原因		8
四、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		15
第一章 现代逻辑的规范性及其问题		23
一、有效性：现代逻辑规范性的效力之源		25
二、来自论证评估实践的质疑		29
三、现代逻辑规范性的理论反思		36
第二章 从传统逻辑到非形式逻辑		51
一、传统逻辑的论证理论及其主要问题		52
二、非形式逻辑的本质与主要论题		72
三、非形式逻辑的现代性特征		92

第三章 后形而上学时代的逻辑合理性观·····	113
一、现代逻辑合理性观的基本特征·····	114
二、后形而上学之思的启示·····	122
三、现代性反思与逻辑合理性观的转型·····	136
第四章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59
一、现阶段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诸种姿态·····	161
二、名辩学、中国古代逻辑与逻辑史的书写·····	172
三、从“据西释中”到科学的比较法·····	184
四、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196
第五章 传统名辩的现代诠释(上)·····	218
一、言与文：语言的双重功能·····	219
二、言语交际的规范与原则·····	223
三、“正名”与意义理论·····	240
四、性与天道：言语交际的限度·····	245
第六章 传统名辩的现代诠释(下)·····	251
一、主体间论辩之必要与可能·····	252
二、庄子：“辩无胜”及其复杂性·····	257
三、后期墨家：“辩胜，当也”·····	264
四、“辩无胜”与“辩有胜”之争的真理观意蕴·····	270
第七章 作为辩证逻辑的论辩术·····	277
一、古希腊论辩术的历史发展·····	278

二、亚里士多德论论辩术及其逻辑特性	293
三、论辩术的当代复兴	308
四、对进一步推进辩证逻辑研究的启示	323
第八章 辩证思维方法的主体间性向度	336
一、一致而百虑：思维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	337
二、辩证思维方法的主体间性向度及其具体表现	341
三、通过百家争鸣推进辩证逻辑的现代化	352
四、化理论为方法：群众观点的新内涵	356
第九章 辩证逻辑与科学的合理性	366
一、科学发现：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	368
二、科学辩护：证实与否证的统一	377
三、科学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386
主要参考文献	394
后 记	412

序“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

高瑞泉

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可谓方兴未艾,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绝对算不上新鲜的话题。坊间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现代性批评论著,从哈贝马斯到查尔斯·泰勒,从福柯到夏尔·波德莱尔,说明“现代性研究”本身作为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思,如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热情。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之后的世界,精神之芜杂和意向之分歧。不过,我们组织编纂出版这一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刊,并非只是泛泛地参与到对时代核心问题的讨论之中,而是自觉地意识到现代性研究中两个相互勾连的环节:第一,“中国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视域中的人文学术。它们构成了本丛书所措意的核心对象,希望以此为中心来贡献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中国的现代性”的概念,以多元现代性或多重现代性之存在为前提。与早期的现代性研究者的观点不同,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单一性不是现代性的正确摹写。哈贝马斯说黑格尔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不过 18 世纪的黑格尔不仅是一位

欧洲中心论者,而且是德国中心论者,中国则完全在他的总体历史之外。本世纪第一年,哈贝马斯应邀访问华东师范大学,在午宴上盛赞中国,说他站在东方明珠顶楼眺望上海,感到自己正在“世界的中心”(the center of the world)。让人领略这位理论大师在社交场上的机敏与魅力,也让我们这些东道主的虚荣心得到无伤大雅的满足。当然“中国的现代性”之被重视,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经济起飞或“中国崛起”成为一个流行的话题,还因为我们对中国经验具有的文化反省和文化自觉。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不但使得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了更合乎辩证法的理解,而且真正面对了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个历史节点:只有当经济合理性和官僚合理性(即认知—工具合理性)明显占据统治地位时,现代社会的病症才会暴露出来。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与世界日益被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相比,使用文化概念来重塑本土现代性的努力是无足轻重的。譬如詹姆逊就认为,人们谈论拉丁美洲的现代性、印度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和儒家的现代性等的时候,会忽略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质。当讨论到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时候,许多人会实际上承认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现代性:詹姆逊就几乎同意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说法,即世界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引起普遍的文明,如像斯密和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允许种种本土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同于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彼此之间也互不相同。它造就的政权通过恢复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获得现代性,而不是模仿西方国家。因此有多种不同的现代性,就像在现代化过程有多种失败的方式一样。

与单一现代性理论所依靠的历史单线进化论预设相反的是,二次大战以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出现了另一种状况,渐渐实现现

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大多拒绝了与现代西方完全同质化的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民主化、个人主义、家庭变化、都市化、工业化、现代教育、大众传媒,到处都看到西方化的影子。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那样:这些东西得到的定义和组织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建制类型和意识形态并不相同,所以多重现代性是对这样的客观情势的一种肯定性描写;诸多文化规划不断得到建构和重构。从全球看,在现代和现代化的社会里,在现代化的各个阶段甚至可以看到更加多样的具体的制度类型。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近代中国尽管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但并未真正沦为殖民地国家;她的悠久而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在与殖民主义对抗的过程中,成为民族意识的强化剂,它曾经与意识形态的目标相结合,或者直接诉诸文化创新的力量,来改写现代性的社会设计。更进一步说,现代性研究本质上是现代社会及其发展前景内在问题的知识化过程,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基本和永恒的若干问题在当下条件中的自觉,是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理性规划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现代性研究,应当在它的历史向度中表达当代人的批评精神和理论创造。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深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之迫切与重要,并且已经有若干重要著作问世;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的现代性”的专门研究,总体上远不及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介绍和翻译之规模。因此,将中国的现代性作为本丛书的研究对象,自然表示了一种提倡和一份努力。

把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与人文学术发展联系起来,是本丛书的又一重目标。众所周知,现今中国的人文学术,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经过20世纪的转变,尤其是取法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科学,由此纳入现代学院体制,成为现代学术形态的知识系统。如果我们同意现代性是特定社会现实和特定世界观的结合的

话,那么人文学术多多少少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认,至少表达了现代性自我确认的努力。我们知道,现代人文学科的形成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密切联系,现在汉语称做“人文学”,英文翻译为 the Humanities 的那些科目,在 15 世纪意大利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这一套科目,它们当然也包括了要学这些科目就必须具备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虽然直到 19 世纪初才出现“人文主义”一词,但是后来人们普遍接受了像布克哈特那样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将人文主义用于他们认为与古典学问的复活有关的新态度和新信念上,即将现代人文学科中的新态度和新信念称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显而易见,西方人文主义,不管其普遍性如何,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知识。事实上,数百年来,以欧洲现代性为中心的世俗化人文主义无论在知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动。

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人文学术当然有她悠久而伟大的传统,但是以古代“四部”之学为内容的传统学术,早就经历了 20 世纪的巨大变革,虽然并未完全变成绝学,毕竟已转变为现代学术的知识形态。且不说,当代中国精神的主流已经是这两股变动之流的不同程度的融合,即使是人文教育中引人注意的中国经典阅读的新实验,也实际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对古代经典做现代诠释。这种诠释或者是强调中国的人文传统具有民族特点的人文主义原则,或者是用一种普遍的人文主义来解释中国经典。无论是关于重写学术史的呼声,还是若干年前开始的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回顾,其实都体现了对人文学术的反省意识和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创造。它的最近走向似乎与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之旨趣有某种内在的契合。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现代性的自我矛盾、自我分裂,在人文学

术的处境变化中获得充分的表露。西方人文主义并未能幸运到能逃避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因而它自身就是分裂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是“人”,它转变成现代性的哲学表达就是主体性,但是后现代主义今天不但宣称哲学根本上要放弃追求那个大写的“真理”,主体性消失了,甚至说“人已死了”。与此相伴的是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与市场机制的扩展,迅速地改塑着人文学科的空间,即使是学院体制内部也不能幸免。人文学术今天的悖论是:一方面人类因为迫切需要生产一种创新文化和提供作为选择的独特生活方式而特别需要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生产不仅受制于内部的观念冲突,而且受制于外部的生存条件。如何破解这个悖论,实在是现代性研究的关键之一。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提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本丛书以此为目标,并不表示怀抱着短时间内就对它展开全面研究的雄心,而只是在提倡以一种持续、局部的具体问题之研究,尝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地逼近这个目标。对于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无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还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学术,都是道地的“为己之学”。所以我们不但相信,假以时日,这项研究一定可以积微为著,有助于我们整体理解现代性而且相信即使是局部的,以个案为中心的工作,也自有其内在的价值。

序

中国古代长期忽视形式逻辑，而朴素的辩证逻辑却获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一些西方逻辑学家的逻辑论著和逻辑思想较集中地被介绍到国内，初步扭转了形式逻辑不受重视的局面。但这主要仍限于传统逻辑，而对当时在国外已迅速发展的数理逻辑未予重视，缺乏必要的介绍与研究。直到1927年汪奠基著《逻辑与数学逻辑论》的问世，才开始有了改变。到30年代中期，金岳霖著《逻辑》的出版标志着我国逻辑学家在数理逻辑的教学和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应当肯定，近代中国在逻辑科学的探讨传播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对此却缺乏系统的总结，正如冯契所指出的：“理论的演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和系统的总结，才能提高自觉性。如果得不到科学的总结，那便会陷于盲目性。”^①这一点，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由“唯物辩证法论战”所引发的、一场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论战中便清楚地

^① 冯契：《〈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序》，《冯契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八卷，第488—489页。

表现了出来。一些人(反对唯物辩证法的人)坚持形式逻辑是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对唯物辩证法或辩证逻辑作为科学方法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进行了系统的否定;而另一些人(进步的哲学家)为了捍卫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及其指导地位,在未划清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界限的条件下,对形式逻辑进行了不适当的批判和否定。其实,争论双方都是把形式逻辑同辩证法、辩证逻辑绝对对立了起来,视为毫不相容的两种方法和两种逻辑。这场论战突出暴露了当时哲学界在逻辑问题上的片面性和盲目性。

这种盲目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20 世纪 50—60 年代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关系的讨论中又继续暴露出来。这场讨论所涉及的问题虽然较多,但要害仍然在于划不清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界限,不能正确理解与判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辩证逻辑的关系。与此同时,数理逻辑及其最新成就仍然被置于大多数讨论者的视野之外,甚至被一些人视之为“帝国主义时代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伪科学”,因而严重阻碍了它在我国的正常发展。

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逻辑科学经受了一场巨大的浩劫。然而人们也正是从这场浩劫中、从“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中开始清醒起来:从其用语录代替一切、随意引申、胡乱发挥、乱扣帽子、随意栽赃等不讲逻辑,特别是不讲推理、论证的恶劣表现中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必要性;从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猖獗、泛滥所带来的恶果中意识到学习和研究辩证逻辑的必要性。正是因此,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曾掀起学习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也包括辩证逻辑)的热潮。作为现代形式逻辑的数理逻辑也开始受到逻辑工作者的重视,学习和研究数理逻辑也成为多数逻辑工作者的自觉要求。所谓逻辑现代化,实则逻辑教学和研究现代

化的问题被提上日程,并由此而展开了逻辑教学和研究是否需要和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

但似乎好景不长。近十年来,虽然逻辑工作者队伍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有了新的提高,逻辑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学生的素质培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正越来越显现,然而逻辑学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与配置中,在普通高校的自学考试,以及在整个社会的实际需要中,其地位与作用都显现出某种下降的趋势,逻辑学似乎越来越为人所漠视,越来越陷入某种困境。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逻辑学在我国近代以来的发展为什么总是这么步履蹒跚、历经艰难曲折呢?逻辑学重新振兴的希望之路又在哪里呢?

这一连串的问题警示人们,逻辑工作者不能再继续陷入盲目性了,逻辑学是到了应该冷静地回顾自己的发展历程、到了应该进行全面系统的自我反思的时候了,是到了应该对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并由此上溯到中国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逻辑科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在认识和对待各分支学科及邻近学科的相互关系方面,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由此获得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等进行自我批判并做出总结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我国逻辑科学以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有客观的、清晰的理解,才能避免对某些问题的争论或讨论,常常出现某种并非螺旋式上升的重复现象,从而也才能逐步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逻辑科学历经坎坷的主要原因,并找到摆脱这种现状和促进我国逻辑科学不断发展和振兴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而且也只有自我批判的条件下已准备好了的时候,才能够对过去向着自己发展

的各个阶段做出客观的理解^①。伴随着当代中国逻辑科学发展进程而成长起来的中国逻辑工作者正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意识到这一点。

正因此,近年来已有一些逻辑工作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当代中国逻辑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及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开始进行反思和回顾,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晋荣东同志的《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一书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写成的。它从逻辑学所肩负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自身需要现代化;另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应当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出发,围绕现代性这一基本原则和要求,把逻辑现代化建设置于当代中国现代化全局的视野中去分析考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逻辑学科在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逻辑学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联系国内外逻辑工作者就这些方面和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与讨论,进行了有重点的、但是系统的反思与回顾,实际上是在尝试对之作出初步的批判性总结。

毋庸置疑,要正确地进行反思与回顾,要科学地做出批判性总结是不容易的。关键在于作者必须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了解和熟悉当代逻辑科学发展的现状及前景,明确其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掌握必需而充分的学术资料(包括相关的新成就和新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高屋建瓴,通过“人体解剖”而把握住“猴体解剖”的钥匙,才有可能对以往阶段持有正确的理解,从而做出科学的恰如其分的论断。就此而言,《逻辑何为》一书所做的工作,

^①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卷,第24页。

总体而言还只能是探索性的。因此，它自然还会存在这样或那样值得去进一步讨论、推敲的问题。但不管如何，作为对这一逝去阶段的反思之作，无论其做得如何，做到了多少，也无论其还将引起多少不同的意见，还有多少问题尚待进一步去努力探索和明确，它都是值得人们欢迎的、肯定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学说，都只有当它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和通过反思而对自己的历史有客观的理解时，才能真正克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才能不断地自我完善。而这种自我批判和系统反思，即使是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也还需要许多人共同努力，经过认真研究和自由讨论，然后才能集中智慧去逐步完成。因此，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探索者，他们的工作都将是有益的、值得赞许的。否则，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努力、去探索，无论我们个人主观上有多么强烈地发展逻辑科学的愿望，无论我们会争论得多么热烈，也无论我们如何去认真努力，恐怕都是难以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而事倍功半的。近代历史上的几次大讨论所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不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么！

写到这里，抚摸着厚厚的书稿，回忆着书稿中的那些真知灼见，不由得让人感慨系之。晋荣东同志可说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年轻的逻辑工作者，他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专业都是中国哲学。前几年，只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他毅然转而从事逻辑学的研究与教学。基于读硕士、博士学位时所奠定的扎实而深厚的哲学功底以及较强的分析综合能力和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再由于他的勤奋和执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游刃有余地担负起普通逻辑的教学工作和逻辑专业研究生的中国逻辑史和辩证逻辑的教学工作，而且还遍览了他可能找到的中外逻辑学者所写的最新论著，并陆续公开发表了一批有关普通逻辑、辩证逻辑、中国逻辑史和非形式逻辑的论文，得到了学界的好评。这充分证明，一个

年轻学人,只要能不囿于个人名利观念的束缚,不追逐虚名、曲学阿世,不心浮气躁,而能专心学术,甘于寂寞,不怕坐冷板凳,认真打好自己的专业基础,尽可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再加上研究方向选择适当,个人勤奋努力,就一定能在学术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为学术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这也证明,我们的年轻一代是一定能珍惜和充分利用当前这宽松而较优越的学习和研究环境,抓住机遇,奋力拼搏,迅速超越老一代学者,而把我国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超旧人,这原本就是历史的必然。宋代词人李清照曾咏叹“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现在中国的逻辑科学是到了应该让后来人更多地去伤脑筋的时候了。我坚信,他们同样会把李清照的咏叹更欢快地继续咏唱下去,自觉地承担起进一步振兴我国逻辑科学的历史重任。

彭漪涟

2005年9月

导 论

虽说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但最近一轮的启动无疑肇始于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历史地看,也正是在这一年,当代中国逻辑与现代化的内在关联首先从“逻辑现代化”、“逻辑为四化服务”等口号中露出了端倪。

一、问题的提出

1978 年 5 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倪鼎夫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努力发展逻辑科学,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发言,将当时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归结为基础薄弱、门类不全、水平不高、队伍很小,并认为这种状况远不能适应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鉴于此,他提出:

逻辑科学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逻辑学自身也要现代化,我们应当研究具有现代化内容的逻辑科学……以满足各类人员对逻辑的需要^①。

^① 倪鼎夫:《努力发展逻辑科学,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在一九七八年全国逻辑讨论会上的发言》,《哲学研究》编辑部:《逻辑学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28 页。

在这次讨论会上,张家龙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为了适应新时期的总任务的要求,摆在逻辑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工作就是要促使形式逻辑现代化。所谓形式逻辑现代化,就是说要大量吸收数理逻辑的成果,丰富和发展形式逻辑,使形式逻辑成为一门崭新的、以数理逻辑武装起来的精密科学^①。

作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鼓吹“逻辑现代化”、“逻辑为四化服务”的主力军,倪、张两人的意见虽引起了与会学者的一定重视,但在会上并未来得及深入的讨论。

次年 8 月,上述口号在第二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得到了较为深入的回应。关于“逻辑现代化”的具体内涵,王宪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逻辑科学在国际范围内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要在教学方面跟上国际水平。尽管我国高校普通逻辑课程的教学内容针对传统逻辑已有所增加和改变,但基本上采用的还是 19 世纪末叶以前的材料,比较陈旧,而形式逻辑在 19 世纪末叶以来取得的丰富和重要的成果尚未以适当的形式吸收到课程里来,因此“逻辑现代化”这一提法应更为准确地理解为“普通逻辑课要现代化”^②。尽管在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逻辑学界对“逻辑现代化”的理解仍然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有必要指出的是,经过王宪钧的如上解释,这一口号的确更多地指向了“(当代中国)高校逻辑课程的现

① 张家龙:《形式逻辑要现代化》,《哲学研究》编辑部:《逻辑学文集》,第 56 页。

② 王宪钧:《逻辑课程的现代化》,北京市逻辑学会编辑组:《全国逻辑讨论会论文选集(197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 页。